

文艺理论学习小辞典

第三輯 合訂本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上 海

文藝一般
文藝理論學習小譯叢
第三輯合訂本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新華印刷廠 上海廠翻版
上海印刷廠印刷
治興記裝訂所裝訂

*

書號(526)[I II 90] 本書 245,500 字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5000 冊

定價 1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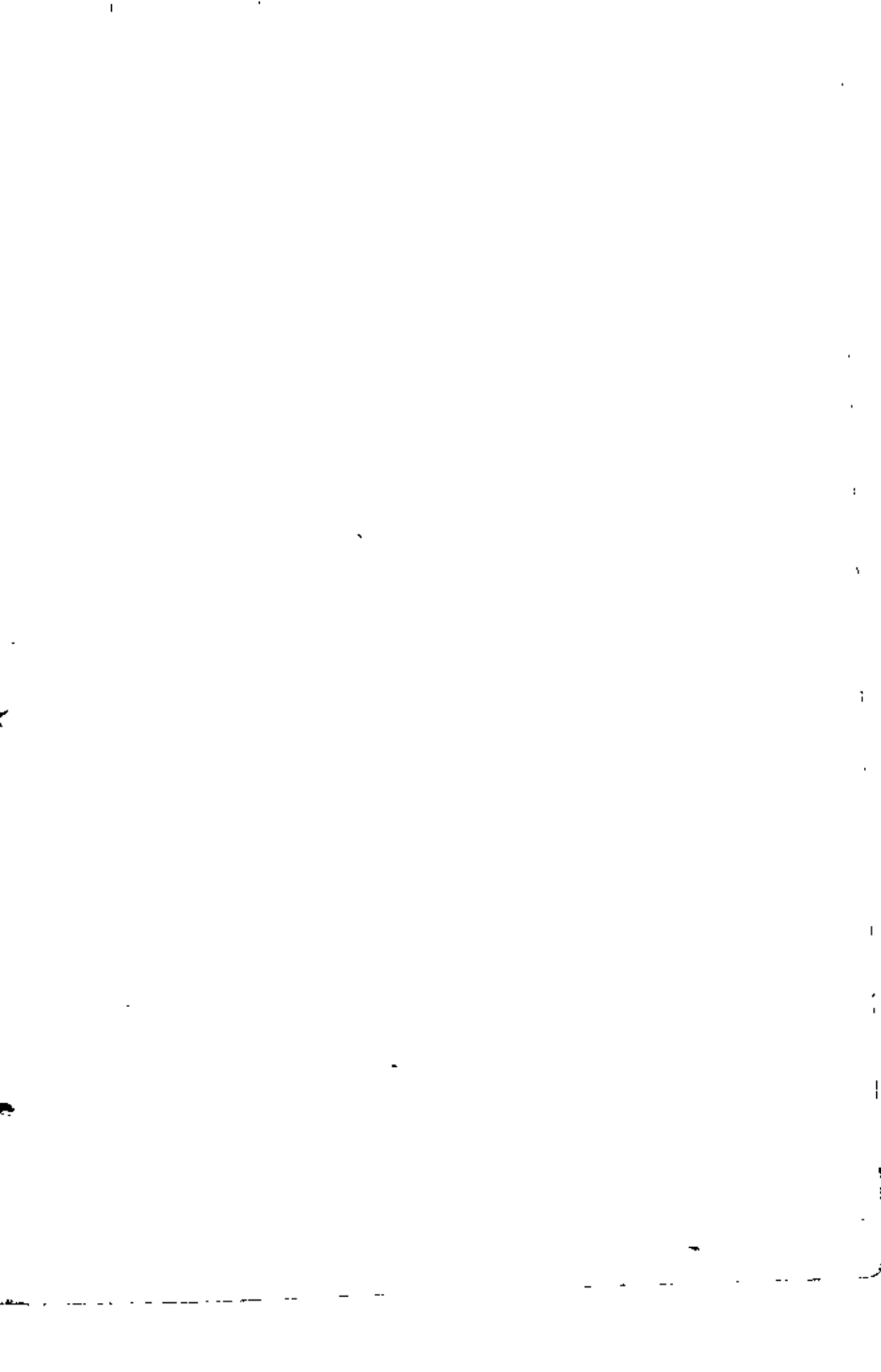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作家協會工作的若干問題

法捷耶夫著 張 舉譯

•



一 關於B·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爲了正義的事業』

在評價B·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爲了正義的事業』，使這部小說以現有的樣子發表出來的這一件事上，『新世界』編輯委員會的大多數人和作家協會書記處的大多數人犯了錯誤，犯了具有思想性質的錯誤。這一錯誤的最大的責任應該由我和A·特伐爾陀夫斯基●負擔，因爲正是我們對於這部長篇小說的不正確的意見才大大地預決了書記處和編委會的錯誤。我努力要發掘我們這一錯誤的意義，從裏面得出必要的結論。

如果從作者的抱負上來看，我們可以怎樣地確定長篇小說已發表的第一卷的主題呢？我想，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這個主題確定成這樣：蘇維埃人保衛斯大林格勒。可是在作品的中心却安排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決不能代表在前線和在後方的蘇維埃人，特別是在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時期裏。事實上，我們軍隊的英勇精神也

好，我們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勞動英勇精神也好，都沒有表現出來。安排在事件的中心的沙波施尼柯夫一家，對於大多數蘇聯知識分子說來，不是特徵的。在描寫這個家庭的時候，作者抱着描寫聾人聽聞的故意佈置的『日常生活』的原則。沙波施尼柯夫一家以及和這家庭有關的一切人的事業和利益的瑣細無聊，給整部小說蓋上了烙印。

像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裏所描寫的那樣的共產黨員，不能夠代表作為蘇聯社會領導的和主導的力量我們的黨；他們不具備為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所特有的那些特徵。

長篇小說裏整個力量的配置是這樣的：我們蘇聯社會裏的最積極的力量若不是沒有被提到首位，就是被描寫得蒼白無力。這樣的對於人物和事件的描繪，在小說裏不是偶然的。

● 特伐爾陀夫斯基（生於一九一〇年），以長詩「華西里·焦爾金」得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現任「新世界」雜誌主編。

在長篇小說的根柢裏隱伏着通過小說的登場人物——契貝靖院士和施特魯姆教授的嘴表現出來的反動的唯心論哲學，作者選取了這兩個人物作爲他自己的見解的主要表達者。

這種哲學的本質並不新穎：生活彷彿在根柢上是一成不變的，生活裏的一切都重複着，發展是繞着圓圈走的。德國法西斯主義被解釋成這樣：似乎人民中間存在着兩種歷古已然的生活原則——善的原則和惡的原則。依據不同的環境，在人民裏面，也像在一個人裏面一樣，或者善的原則浮到表面，或者惡的原則浮到表面。在契貝靖和施特魯姆看來，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就在於惡的原則在德國人民裏面浮了上來。這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歷史哲學』，還用得着說歷？

『循環』論對於格羅斯曼本人也是不新穎的：他早在劇本『如果相信畢達哥拉斯學派門徒的話』裏就貫徹了這種理論。把這一反動理論引入我們文學的企圖，也是早已有過的。例如，我們應該記得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間舉行的若干次文學討論，以及那時被駁斥了的M·李甫希茨發表在『文學批評家』●雜誌上的關於『現實的永久範疇』、關於『循環』論等等的主張。爲了確證循環論，李甫希茨

引證了維柯，赫拉克里特，『傳道書』。可是，他却不提到，今天把這一反動思想大捧特捧——並且不是偶然地——的，正是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一位論客斯賓格列爾。這種思想是這樣地和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敵對的，是用不着說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

辯證法認為，不應把發展過程瞭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把它瞭解為過去事物底簡單重複，而應把它瞭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由簡單發展到複雜，由低級發展到高級的過程。①

存在着歷古已然的、一成不變的、只是起伏交替的生活原則的這種反動理論，隱伏在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的根柢裏。根據這種觀點，作者比較方便的自然是在小說的中心描寫一些這樣的人，他們的存在不是充滿着鬥爭的激情和偉大的改造

● 這刊物現已停刊。

●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中譯本第一三八頁，人民出版社版。

社會的思想，而是充滿着日常生活的瑣事。『秩序和混亂，靜止和運動，「高貴的樸素與平靜的宏壯」對照着蓬勃的生活現象——這一切都是屬於現實的永久範疇的概念，』李甫希茨當時這樣說過，正是預示了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的出現。

我們完全不想說，格羅斯曼沒有權利在小說裏描寫抱有這樣的見解的『教授』。如果從蘇聯報刊上所登載的對格羅斯曼小說的批評裏面得出結論說，描寫和我們背道而馳的人，抱有敵對的哲學的人，在蘇聯文學中不可被容許，那是不對的。恰巧相反，我們可以，而且必須表現我們的反對者，以便更鮮明地表現我們的見解的正確和我們的事業的勝利。可是，格羅斯曼却以作者身份對契貝靖和施特魯姆發出了聳人聽聞的同情。這使讀者明白，契貝靖和施特魯姆的反動見解正就是作者的見解。

人們譴責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不是因為蘇聯現實裏沒有陷於『日常瑣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的人們，或者因為像沙波施尼柯夫這樣的家庭不可能存在。由於我們教育工作的缺點以及我們發展中的矛盾，我們這兒還有不少的人，他們多多少少誠懇地完成着工作任務，但他們的興趣總是在家庭的圈子裏打轉，或者無論如何

總是爬不出瑣細的日常生活利益的範圍。我們這兒有一些人，他們帶有着公開的或用美麗詞句掩蔽起來的庸俗作風的殘餘。表現這樣的家庭，是可以的，並且有益的。可是，格羅斯曼把這樣的家庭寫成了蘇維埃人的感情的主要表達者。

把這一般地非常庸俗的家庭安排在長篇小說的中心，他這樣做就是歪曲了生活。

給長篇小說蓋上了悲觀主義的烙印的灰暗陰沉必遭滅亡的氣氛是從哪兒來的呢？如果生活裏的一切老在圈子裏繞來繞去，如果一切都一成不變，那麼，世上的戰爭是不變的，人的生活也是不變的。人們作着各種各樣的努力，鬥爭着，等等，等等，可是，歸根結蒂，生活一般地仍舊是毫無意義的，悲慘的。實在說來，這便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全部『哲學』。大多數登場人物的帶原則性的瑣細以及其中若干人的滅亡的毫無意義與偶然，便是因此而造成的。作者知道必須把我們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吸收到小說的軌道上來，可是由於不正確的概念的緣故，小說不能在深度上發展，却只能在闊度上擴大，因此就產生了結構上的鬆弛。許多一般地很正確的命題——例如黨的作用——在長篇小說裏只是宣言式地觸及一下。

描寫鐵工諾維柯夫，或在長篇小說第一卷結尾描繪集體農莊的勞動，都令人感覺到作者下筆的匆忙，說明了作者寫這些東西，沒有懷着愛情，却是由於責任。格羅斯曼的作法，慣於用同一種聲調冗長地描寫大事件和小事件。

同時，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是一個擁有着無庸置疑的職業的熟練的人。作者的才能，在許多場面和許多形象上都可以看出來。充滿崇高的鬥爭的活生生的生活，發生在小說以外的現實生活，有時還是要衝破故意佈置的瑣細的敘述而顯現出來。長篇小說裏有一些描寫瓦維洛夫、別達慈金的形象的優美的、真摯的篇頁。保衛車站的幾章裏的戰鬥插曲和其他一些前線的場面，都很有力。法西斯陣營被尖銳地表現了出來。然而，問題的這一面，却不能取消長篇小說在整體上的思想的毛病以及由此而生的根本的思想藝術的缺點——描寫蘇維埃人的不正確的態度，對蘇維埃人的卑視。

這便是我們的錯誤應該被認為是重大的錯誤的原因。這錯誤證明了我們，犯錯誤的人，沒有表現出必要的思想的嚴格性與原則性，這樣就促成了思想有害的東西在報刊上的出現。

擁有着在文學問題上比較經驗宏富的一些人的書記處，怎麼會忽視了長篇小說的這樣重大的思想毛病呢？在長篇小說發表之前，是不是有人提過意見，對這一點警告道呢？是的，有人提過意見，並且這樣的意見不在少數。

環繞這部長篇小說，在它發表之前，就發生過持續達許多年之久的討論。遺憾的是，這種討論沒有達到廣大的文學的輿論界，只是在編委會和書記處狹小的圈子裏進行着，而在這部小說發表了之後，才輕微地影響到作家協會的主席團——這作家協會的主席團是我們的機關，應該來解決這些原則性的問題的。

當長篇小說最初出現在『新世界』編輯部的時候，B·亞加波夫在雜誌的編委會會議上非常決絕地批評了這部長篇小說，正是因為它裏面包含着反動哲學。

當長篇小說轉交給『新世界』編委會的新的成員審查的時候，在那邊，為這部小說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這討論又移轉到作家協會的書記處，M·布賓諾夫在那裏發言道：

、長篇小說裏缺乏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氣氛，它的真正的英雄，黨組織，工人階級……長篇

小說這樣滲透着庸俗作風，小市民性，使人覺得這簡直不是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家庭，而是從舊時代的什麼地方來的……當這整個世界浮露到長篇小說「斯大林格勒」^①的篇頁上來的時候，這就成了對斯大林格勒保衛者們的誹謗。

在書記處的這次會議上，卡塔耶夫也發了言。他講到格羅斯曼和他的觀念：

我不喜歡他對哲學的抱負。托爾斯泰和蒂爾^②論爭過，和關於衛國戰爭的傳統意見論爭過，可是……我們却有着精神的與政治的團結，我的想法正像黨的想法一樣……如果空想什麼哲學的「獨立性」，它就會使這部小說變得貧弱起來。

長篇小說不止一次地改寫過。討論又一次在書記處展開了，所有一切上面列舉的作家都重申了自己的意見。此外又加上了B·柯席夫尼柯夫：『從藝術觀點上看來，人物寫得很生動，但我們的社會力量在這些人物身上却沒有表現出來……在他們身上看不出自由意志的特徵，那是當人們遵循着自覺，就是遵循着我們叫做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感情的時候會有的。』

當長篇小說發表了出來，遠遠在蘇聯報刊上撰文講到它之前，軍事出版局的編

輯之一喀茲洛夫同志在散文組第一次對這部小說的討論會上發了言。他對這部長篇小說的評價基本上是不對的，可是他也作了一些極重要的批評，那是誰都沒有予以注意的：

我想指出一下格羅斯曼的哲學裏存在着的錯誤。我覺得，這錯誤和在「如果相信畢達哥拉斯學派門徒的話」裏所犯的錯誤是大同小異的。

這樣，在對這部長篇小說的評價中曾經有過足夠多的意見，應該可以使我們驚醒，使我們深思。可是為什麼沒有這樣呢？因為無論是在蘇聯作家協會裏或在編輯委員會裏都形成了這樣的局面：解決許多帶思想性質的問題——評價作品，闡明某一個嚴重的問題——經常是以少數領導幹部的意見為轉移的。我們在工作中很少應用集體性的正常的原則。

● 魯保「爲了正義的事業」的另一題名。

● 蒂爾（一七九七——一八七三），法國歷史家。

作家協會書記處，如果拿它的莫斯科部分來說，只是形式上由十個人所組成，而實際起作用的人數還要少得多。同時在工作的總只有兩三個人，缺點之一就是完全把主席團的工作包辦去了。可是主席團代表着我們作家組織的最多種多樣的力量，事實上正是它，才應該考慮公衆的意見，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來解決我們文學的基本的思想的與創作的問題。

這便是我們在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爲了正義的事業』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裏面可以得出的結論之一。

我們必須經常記得，在集體領導的問題上，我們有着斯大林同志的詳盡無遺的指示。他說：

不，單獨地決定問題是不行的。單獨的決定，經常地、或者幾乎經常地總是片面的決定。在每一個幹事會裏，在每一個集體裏，都有一些人的意見應該予以重視。在每一個幹事會裏，在每一個集體裏，都有一些人也會發表不正確的意見。根據三次革命的經驗，我們知道，大約在一百次沒有集體地加以審查、修正的單獨的決定裏面，總有九十次決定是片面的。

二 關於『新世界』雜誌編輯部的錯誤

在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問題上所發生的錯誤，迫使作家協會書記處仔細地分析『新世界』雜誌的工作。

『新世界』雜誌的工作中有着許多錯誤。有一些是對於我們文學非常重要的帶思想性質的錯誤。也有一些簡單地是雜誌編輯工作中的粗枝大葉作風的表現。

大家知道，在『新世界』雜誌上登載過 A·古爾維奇^①的反愛國主義的論文『正面典範的力量』。這錯誤也是在書記處的成員——法捷耶夫和蘇爾柯夫的支持下犯了的，然而這却不能解除雜誌編輯部的責任。

在這雜誌上登載過 H·亞謝耶夫的思想上不正確的詩『楊柳』。

在『新世界』雜誌上出現過 B·奧格烏夫的論文『需要明朗！』^②，對於馬

① 古爾維奇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一筆抹煞古典文學的進步意義，武斷地說：古典文學沒有創造過，也不可能創造肯定人物的典型，這種理論被『真理報』正確地斥為反愛國主義見解的再現。

② 奧格烏夫的錯誤在於對馬雅柯夫斯基早期詩歌的未來主義傾向採取無批判態度。

雅柯夫斯基的遺產作了不正確的、從小集團立場出發的評價。

『新世界』雜誌的最重大的錯誤是它刊載了С·卡扎凱維奇的中篇小說『朋友的心』（一九五三年第一期）。這篇中篇小說有許多方面，和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裏遭受到批評的部分正是遙遙呼應的。在這中篇小說上，同樣地也蓋上了彷彿人們灰暗陰沉必遭滅亡似的烙印。在表現人物方面，卡扎凱維奇沒有達到像格羅斯曼那樣的程度，但也有着故意貶低英勇精神的作法。舉戰艦傑出的指揮員巴傑伊金艦長做例來說吧。他在家庭裏被表現成這樣的一個人，連卡扎凱維奇自己都說，有人看到了這一幅小市民趣味的圖畫，就不會對巴傑伊金抱有正確的概念。可是這對於評定這樣一個人是不是對的呢？

再舉中篇小說裏主要的主人公亞基莫夫，一個完整無缺的人，和一個同志一同到一個獨身的女教師家裏的這段插曲●來說吧。

亞基莫夫回到朋友們那兒去，其中還有他所愛的姑娘●，他竟做得若無其事，他自己講到自己：『一個人能夠多麼巧妙地掩蓋自己的醜惡的祕密啊。』

亞基莫夫和女教師之間的事可能發生在這個主人公的身上麼？在生活裏，什